

嬗变与命运

史伟刚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嬗变与命运

史伟刚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嬗变与命运/史伟刚著.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6.9
ISBN 7-80170-510-6

I . 嫣... II . 史... III . 社会主义—研究
IV . D03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97782 号

出版人 周五一

责任编辑 陈德仁

装帧设计 美迪图文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ddzgcb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辑部 (010)66572152 66572154 66572155

市场部 (010)66572157 66572281 66111785

印 刷 浙江省煤田地质局制图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375 印张 185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3.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果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010)66572159



史伟刚，1965年11月出生，浙江象山人，法学硕士。长期在高校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和研究，主要研究领域和方向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先后在《社会主义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近30篇。现为宁波工程学院社会科学部书记、副教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校中青年骨干教师。

导 论

自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以来,关于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问题就一直为世人所关注。1991年12月,苏联在经历了七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后,无产阶级政权被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被颠覆,这标志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结束,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伴随着苏联剧变,关于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问题,再次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苏联演变被人们称为20世纪的“历史之谜”。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其存在的七十多年时间中,从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迅速崛起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创造了世界社会主义的一段辉煌历史,也大大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就是这样一个唯一能够与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大国,却在转眼间土崩瓦解了。人们不仅要问,一个有着七十多年辉煌历史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会迅速地走向自己的背面而发生了社会制度的转换?一个有着七十多年执政历史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为什么会在人民的冷漠注视中失去政权并自行解散?弄清苏联演变发生的根源并从中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教训,无论是对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对将来准备走向社会主义的国家,无疑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弹指间15年已经过去了,苏联剧变这一影响世界发展格局的重大事件可以说已经成为了历史。然而,15年来,无论是社会主

义者还是非社会主义者，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分析和探讨一直没有停止过。直到今天，这种分析和探讨还在进行，并不断加深。随着对这一历史事件研究的不断深入，关注的焦点越来越集中在探究演变发生的根源这一问题上。到目前为止，关于苏联演变的根源，学界达成了一点共识，那就是苏联演变是历史合力的产物，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既有历史因素，也有现实因素；既有经济因素，也有政治文化因素；既有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的外在因素，更有社会主义国家本身的内在因素。总的来说，是几十年来不断积累下来，潜伏着的社会矛盾恶化发展和总爆发的结果，是内因和外因共同的作用促使了苏联演变的发生。

对苏联演变的原因，应该从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加以分析揭示，仅仅停留在对具体原因的分析上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不应该忘记，“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① 透过纷繁复杂的种种原因，探究隐藏其后的根源，是研究苏联演变问题的重中之中。

十几年来，围绕着苏联演变的根源，国内外学者从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历史传统等方面，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多方位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当然，不同的人从不同的阶级立场、不同的审视角度、不同的利害关系出发，得出的结论也是五花八门的。刘昀献在《对十年来中外学者关于苏联演变原因的评价》一文中列出了有代表性的 12 种主要观点，有“和平演变说”、“乌托邦说”、“原罪说”、“葬送说”、“民族矛盾说”、“上层自决说”、“经济没搞好说”、“斯大林模式说”、“错误路线说”、“意识形态说”、“抛弃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320、322 页。

说”、“历史合力说”等,^①其实何止 12 种;李兴耕在《前车之鉴》一书中对俄罗斯关于苏联演变问题的各种观点也进行了综述,林林总总,不下几十种。这种状况一方面说明学界对苏联演变根源的研究依然是十分关注的,另一方面也说明在什么是苏联演变的深层次根源这个关键问题上,分歧依然。因此,对此继续进行深入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在众多关于苏联演变深层次根源的观点中,有些观点明显有立场的错误,如马克思主义乌托邦说、十月革命原罪说等,学界已经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批驳;有些观点虽然有道理,但只要稍加分析就可以发现,作为深层次的根源是站不住脚的。如和平演变说。我们并不否认——事实上也不可能否认——苏联剧变,包括东欧各国的演变是在国际上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斗争的大背景下发生的,与西方资本主义敌对势力对它施加的种种渗透和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把它作为演变的深层次根源是没有说服力的。一方面,外因虽然在事物的发展、变化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但终究只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条件,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不在事物的外部,是在事物的内部。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在苏联刚刚建立时就开始实施了,而且不仅只是对苏联,对其它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古巴等都是一样的实施“和平演变”战略。它们确曾使出所有的压力想去击败社会主义,但它们在社会主义包括苏联弱小和落后的年代尚且未能得逞,那么在苏联已经达到其国力和成就巅峰的时候它们却能成功,这难道不让人莫名其妙么?因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对苏联、东欧的剧变只是起了催化和促进作用。西方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支持是苏东各国政治反动派能够夺取政权的外部条件,这不应该是剧变的深层次根源。还有一些观点是需要作进一步认真的

^① 刘均献:《对 10 年来中外学者关于苏联演变原因的评价》,《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1)

分析的，本书将在第一章中对其中的四种主要观点作述评。第一种观点认为经济没有搞好是根本的原因。这种观点以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是基础”的思想作为理论依据，认为苏联经过七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经济上依然落后于美国，不能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并驾齐驱，于是在同资本主义的竞争中败下阵来。这种观点看似正确，实际上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历史逻辑。第二种观点认为戈尔巴乔夫是苏联剧变的主因，苏联剧变“这一切都是戈尔巴乔夫干的”。^① 我们无须也无意为戈尔巴乔夫开脱罪责，在苏联的剧变中，戈尔巴乔夫的确是罪责难逃，戈尔巴乔夫错误的路线把改革引向了歧途，直接葬送了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因此，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转向是导致苏联演变的直接原因。但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人都永远不会相信，就凭戈尔巴乔夫一个人的力量能在短短的几年间，让一个有着七十多年光辉历史的社会主义苏联土崩瓦解。因此，如果把苏联剧变的根源仅仅归结为戈尔巴乔夫的错，那无疑是把更深刻的问题给掩盖了。第三种观点认为苏联演变的根本原因在于苏共的建设没有搞好，是苏共党内的既得利益阶层的“完全有意识的行为”推动着苏联走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说苏共没有建设好，无疑是正确的。但仅此而已是远远不够的：为什么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内部会形成一个既得利益阶层？至少这是一个更加深层的问题。第四种观点认为高度集中的“斯大林模式”是根本原因。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体制层面对苏联演变的根本原因展开研究。这无疑是一种更为深入的分析。“斯大林模式”的弊端是客观存在的，长期实行“斯大林模式”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明显的，上述三种主要观点所描述的现象的根源都可以从体制上得到合理的解释。尽管如此，把体制看作是苏联崩溃的根本原因，依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且不说这种体制在苏联的发展

^① 罗伊·麦德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45页。

过程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就从一般的角度看，任何的体制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体制缺陷的必然结果是改革体制，而不是摧毁社会制度。这一点，中国改革的成功实践是最好的例证，资本主义战后发展的事实也可以证明。其实，体制(模式)本身只是一种工具，寻找问题的根本显然不能只停留在工具的层面上。体制是由理论决定的，即有什么样的指导理论及体现这一理论的经济、政治原则，就会有什么样的体制或模式。显然，体制模式背后还有更为深层的原因，那就是体制模式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理论。关于苏联演变根源问题的争论还将继续，关于苏联演变根源问题的研究还将深入，毕竟要对苏联演变这一具有世界影响的历史事件根源的认识达成一致，十五年的时间还是太短了。回顾十五年来关于苏联演变深层次根源的研究过程，可以得出两个基本的判断：一是苏联社会主义不是在那个具体问题上出了问题，而是在根本性的问题上出了问题。因此，探究苏联演变的根源必须要从根本的理论问题，即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问题着手，因为有什么样的理论，就会有什么样的行动，对社会主义有怎样的认识和理解，就会有怎样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从而直接影响和指导着社会主义的实践。看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能把握住根本；二是探究苏联演变的根源不能简单地就事论事，就演变论演变，必须跳出演变看演变，跳出苏联看苏联，把它放到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这样可以使我们对演变的根源有更准确的认识和把握。就事论事往往不能准确地把握事实真相，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其山中，就是这样的道理。

二

本书关于“社会主义观的嬗变与苏联社会主义的命运”的主题，就是从反思关于苏联演变深层次根源的争论中得出的。实际上，国内外许多学者在谈到苏联演变的原因时，都会谈到斯大林及

其后继者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问题，但都没有对此作更深入的专题研究，对不同时期不同的社会主义观对苏联社会主义命运的影响作用估计不足。只要认真回顾苏联社会主义七十多年的历史，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苏联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命运是与苏联不同时期的社会主义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读读邓小平的有关论述，对我们深刻认识这一点无疑是大有裨益的。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搞清楚。”^①“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②在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的众多经验教训中，“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楚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③

基于这样的认识，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苏联不同时期对社会主义的不同认识为主线，试图阐释苏联不同时期不同的社会主义观对苏联社会主义命运的不同影响。

观，在汉语中有三种含义，一是看，如观察，观光等；二是指看到的景象，如奇观，壮观等；三是指对事物的认识和看法，如世界观、人生观等，这是人们从某一角度或立场出发形成的对事物总的认识和看法。这种总认识和看法一旦形成，往往就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导思想，对人们的行动过程和行动结果产生重大的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社会主义观中的“观”，应该就是第三种含义。所谓社会主义观，就是对社会主义的总认识和看法，它的核心问题是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实现和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发展历史进程中，对这一根本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不同的社会主义观。从 1516 年莫尔发表《乌托邦》算起，社会主义至今已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139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137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223 页。

经有近五百年的历史了,如果不分时间和空间,古今中外可以列举出很多观点迥异的社会主义观。在这些不同的社会主义观的指导下,社会主义的实践也各不相同,其结果当然也是各不相同。

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的。但20世纪社会主义的实践与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相比,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像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在几个国家“同时发生”,“同时胜利”,而是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首先取得胜利,整个社会主义发展到今天,在全球范围内也只有少数的几个国家取得胜利。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将在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中生存,“两个体系并存”和“一球两制”的格局将是现实的社会主义必须要面对的。二是社会主义革命并未像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设想的那样首先在英、德、法、美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全面爆发并取得胜利,相反是在俄国、中国这样资本主义并不发展,甚至是落后的国家中首先爆发并取得胜利。

这两个首先,一方面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有关论断,另一方面也使得现实社会主义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落后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发展社会主义,理论上没有既定的答案可供参考,实践上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列宁称之为“我们的革命是开始容易,继续比较困难”。^① 在这样的落后国家,在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中,如何建设好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历史性课题摆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建设者面前,要求社会主义者去实践、探索,并作出正确的回答。

纵观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历程,可以发现,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苏联并没有很好地认识并解决好这一问题,不同时期的苏联领导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理论脱离实际,急于求成的现象,表现出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集中表现在对社会主义认识的理想主义和

^① 《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43页。

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认识的绝对化。

对社会主义认识的理想化

第一种带有理想化色彩的模式就是“军事共产主义”。“军事共产主义”是为了迅速向纯粹的社会主义过渡而采取的一种措施，它的特征就是消灭货币商品关系，对经济实行高度集中管理，由国家直接控制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这种模式的选择完全是基于马、恩对未来社会的构想而非俄国社会主义的现实，是列宁早期社会主义观的真实表现。在遭到农民以及资产阶级的反对时，列宁认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必须依靠专政和强制，“认为不要强制，不要专政，便可以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那就是极端的愚蠢和荒唐的空想主义”。^①事实却是，“军事共产主义”不仅没有使苏俄迅速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相反加剧了经济困难，引起了社会不满情绪的增长。面对困境，列宁提出了利用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迂回过渡”新思想。从“直接过渡”到“迂回过渡”，是列宁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一次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核心在于列宁认识社会主义视角的根本转变，就是把认识社会主义的视角从书本转移到了实践。“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实现社会主义“迂回过渡”的政策选择。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变为“新经济政策”，有客观的因素，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列宁以及布尔什维克人对俄国社会主义认识的改变。如果没有指导思想上的改变，即使面对客观环境的巨大变化，也难以有政策上的变化。这一点，已经被苏联以后几十年的发展历史所证明。

斯大林在工业化取得了初步成就和实现了农业集体化后，就在1936年中止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演说中宣布，苏联的过渡时期已经结束，苏联“已经基本实现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1938年在联共(布)十八大上进一步

^① 陆南泉等：《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23页。

指出：苏联“按其形式和职能来说是和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大不相同的”社会，苏联的任务是向共产主义过渡。1952年的苏共十九大则正式宣布，苏联已经建成社会主义，今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向共产主义前进。

应该看到，斯大林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①而且这种革命的激情也确实激发了人民建设共产主义的热情，但从根本上看，这种对建成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过于简单的认识却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战后的苏联并不具备立即向共产主义前进的成熟的客观条件。尽快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已经确定，那么，在一个小农占优势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资本主义包围而又孤立无助的情况下，如何在短短的几十时间内走完这段历程呢？依靠正常的经济发展模式吗？那是“乌龟爬行”的速度。必须用非常规的特殊手段才能实现，那就是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去解决经济任务”，为了使这个落后的国家迅速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尽快实现共产主义，一切手段哪怕是强制、不民主的，都是必要的和完全合理的，工业化是如此，农业集体化更是如此，高度集中的经济模式随之应运而生。高度集中的经济模式需要高度集中的政治模式作为它的坚强保障，没有高度集中的政治模式的保驾护航，高度集中的经济模式的运转是不可能的。经济的统制、政治的统制，势必要求思想的统制、文化的统制；而思想文化的统制，反过来又促进、巩固经济的统制和政治的统制，三者浑然一体。高度集中的斯大林模式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

关于“斯大林模式”的功与过，至今有多种不同的评价。从俄国——苏联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角度，它的确极大地促进了这个落后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为苏联在战后步入世界超级大国打下了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9—140页。

基础。但它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它的整个运行机制和体制缺少活力，具有很大的封闭性，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其实，任何体制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在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上，对于“斯大林模式”的这些弊端，从赫鲁晓夫开始就有认识，并发起了改革运动，但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几十年的改革不仅没有突破斯大林模式，反而使得这种模式进一步强化。所以，最根本的问题不是简单地去探讨这种体制是不是存在和存在什么样的缺陷，甚至是致命的缺陷，而是要去探讨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体制，为什么发现了这种体制的弊端甚至是致命的缺陷而必须进行改革时，却又始终不能突破它。

根本原因何在？根本原因就在于几十年间斯大林的继任者们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认识始终没有跳出过斯大林的理论框架，最明显地表现在对苏联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定位上。赫鲁晓夫虽然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但对超越发展阶段的历史定位不仅没有加以纠正，而且比斯大林走得更远。在 1959 年的苏共二十一大上赫鲁晓夫提出，苏联已经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新时期，苏联将用十五年的时间实现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1961 年苏共二十二大更是提出，用二十年时间到 1980 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以后的勃列日涅夫虽然修改了赫鲁晓夫关于苏联进入了“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新时期的提法，但依然宣布苏联已经进入甚至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开始向共产主义社会进军。安德罗波夫仍肯定苏联处在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但是处在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起点。尽管戈尔巴乔夫在 1986 年使用了“发展中社会主义”的提法，但这并没有成为苏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依据。事实上，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也是理想主义的一种表现，而且是更为浪漫的理想主义，只不过内容变得右罢了。在新形势下，苏共和苏联社会普遍希望通过一种激进的改革，迅速改变国家现状，建立起“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苏共主要领导人寄希望于

国际范围内的阶级调和与合作，希望化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和对立；骤然推行的民主化、公开性，固然“解放”了思想，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陷入了极度的混乱，使得人们对历史、现实和将来认识无所适从。与以往相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更是“陷入浪漫的理想主义，甚至完全是幻想、空想。”^①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最终打破了“斯大林模式”，却失去了社会主义苏联。

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有理想，但理想必须要切合实际，脱离实际的理想只能是一种良好的愿望而最终归于空想。过分的理想主义往往造成认识上的偏差，导致战略和决策的失误，而过激的政策和不切实际的许诺又反过来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最终造成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信任危机、信心危机、信仰危机和政治冷漠。

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认识上的绝对化

与对社会主义认识上的理想主义相联系的是，在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认识上的绝对化：片面强调资本主义的腐朽和垂死而看不到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的能力和发展的潜力，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简单地、绝对地对立起来。

社会主义首先在几个国家取得胜利后，在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中建设社会主义，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现实社会主义者必须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进行了反复的探索，特别是他的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思想，无疑是20世纪社会主义者对这一历史课题所作出的第一份正确的答案。

在试图用“战时共产主义”的做法，“不经过旧经济适应社会主义经济的时期直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办法，被实践证明脱离了俄国的国情，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再加上国内外敌人的武装

^① 许新 陈联璧等：《超级大国的崩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361页。

干涉，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后，列宁深刻认识到，“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者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① 他极为鲜明地断定说：“苏维埃政权 + 普鲁士的铁路秩序 + 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 + 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 + + = 总和 = 社会主义”。^② 因此，“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③ “要获得胜利，就必须懂得旧资产阶级世界的全部悠久历史，要建设共产主义，就必须掌握技术，掌握科学，并为了更广大的群众而运用它们，而这种技术和科学只有从资产阶级那里才能获得。”^④ 所以必须要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这是我们头等的最主要的任务。”^⑤ “把资本主义所积累的一切最丰富的、从历史角度讲对我们是必然需要的全部文化、知识和技术由资本主义的工具变成社会主义的工具”，^⑥ 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列宁的这些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有力地促进了苏俄经济建设。

但斯大林在列宁逝世后不久，就结束了新经济政策，停止了对西方开放的政策。斯大林反复强调，由于有了无产阶级政权，苏联能够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用自己的力量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斯大林明确指出，一系列人民

① 《列宁论新经济政策》，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8页。

②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20页。

③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92页。

④ 《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83页。

⑤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09页。

⑥ 《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57页。

民主国家已经脱离了资本主义体系，“和苏联一起形成了统一的和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而与资本主义阵营相对立”，而“两大阵营的存在所造成的经济结果，就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了，因而现在就有了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这种情况决定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因此，关于“资本主义虽然腐朽，‘但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的论点……已经失效了。”^① 在总危机进一步加深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市场是不断衰败和缩小的，而社会主义市场是不断繁荣和壮大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不仅不需要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商品，而且它们自己还会感到必须把自己生产的多余的商品输往他国”。^② 苏联乃至东欧等国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绝不应该通过改革开放招致那些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绝对不相容的各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因素在苏联的出现。1947年，苏联应邀参加“马歇尔计划”。在讨论如何落实该计划的巴黎会议上，苏联代表团团长指责实施该计划将使“欧洲各国必将落入被监督国家的地位，并使其放弃原有的经济自主和民族独立地位”。^③ 苏联拒绝参加，也禁止东欧国家参加。其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是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简单地对立了起来，在资本主义仍然是世界经济主体的情况下，这实际上也把社会主义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割裂开来。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长时期被一些似是而非的片面论断和“激进”政策所左右，简单而绝对地把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一概定为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中间隔着一堵厚厚的墙，它们之间不仅是没有联系的，而且是绝对的、全方面的对立。所有那些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绝对对立起来的观念，在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抵御

① 《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20～621页。

②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62页。

③ 转引自陆南泉等主编：《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68页。